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

当代魅力

郭宝宏 著



人民大学出版社

MAKESI ZHUYI GUOJIA LILUN DE DANGDAI MEILI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 当代魅力

郭宝宏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崔秀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魅力/郭宝宏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01-011136-0

I. ①马… II. ①郭… III. ①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 IV. ①D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4992 号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魅力

MAKESI ZHUYI GUOJIA LILUN DE DANGDAI MEILI

郭宝宏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9

字数:44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1136-0 定价:63.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21 世纪初,我在上海创办海派经济论坛时认识了宁波大学郭宝宏同志。他写的书《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年版)、《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3 年版)等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我认为书中的观点很好地坚守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曾邀请宝宏同志参与海派经济论坛的学术工作。调北京工作后,由于工作繁忙,与宝宏教授的联系减少了,但他每出版新著总要寄我一本,如《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简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论人的需要》(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等,翻阅之后,感觉宝宏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十分坚定,紧扣当代实际撰写的著作洋溢着马克思主义的气息,尽管个别观点还有值得推敲之处,但长期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园地辛勤耕耘的锲而不舍的精神,还是令我感动和欣慰。因此,当他提出让我为他的新著《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魅力》写一篇序的时候,我便欣然答应了。

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苏联、东欧各国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在当代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中仍具有难以动摇的指导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显然并不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赏识,特别是其中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各国为防止本国无产阶级向东欧各国学习,竞相以种种“福利国家”政策瓦解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此后,不仅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甚至某些自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淡忘或者说公然完全否定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大都持批判或挑剔的态度,或者停留在仅仅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狭隘的社会现实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状况。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来,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资本主义大有一

2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魅力

统天下之势,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不屑一顾的情况。在相当一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即使没过时,也很难用来指导我们认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了,全球化现实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教条”。一些学者的论著中偶尔也会引用几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论断,但大多是为了装饰门面,显得十分勉强。大多数学者脱离全球化中国际国内阶级矛盾、阶级关系演变的现实,抽象地议论国家主权、国家主权的让渡、国家利益、全球治理、善治和民主政治等等,好像全球化使得人类可以对国际国内的阶级矛盾忽略不计,世界各国只需自觉让渡主权,共同致力于全球治理,就可实现共同繁荣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宝宏教授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魅力》一书出版了。著作的标题就显出很强的吸引力。全球化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遇到了怎样的困惑,这些困惑应当如何解读,在解读“困惑”的过程中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放射出“当代魅力”?对马克思主义稍有理解的人都会对这些问题发生兴趣。那么,宝宏教授的著作是否正确解读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遇到的“困惑”,是否做到了让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全球化条件下展示出真理的魅力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回答无足轻重,我把它交给广大读者。但在此谈谈我对这部著作的看法却是可以的。

浏览全书,我觉得以下几点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承继性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体系”。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常常割断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斯大林之间的联系,孤立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斯大林,这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往往导致片面的结论。宝宏教授的著作排除了这种做法,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理论看做不可分割的统一的体系,即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由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经典作家根据各自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的发展、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作了继承和发扬。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没有停止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也没有停止在列宁、斯大林或毛泽东、邓小平那里,而是与时俱进地发展着的科学理论。这个理论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理论,又植根于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因而具有强大的、不朽的生命力。

其次,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时代困惑”及其产生的原因,作了

直白的叙述和客观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存在着“时代困惑”早已不是新鲜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早就提出了。我国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在有关国家问题的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采取的漠视和敬而远之的态度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其实,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全球化迅猛发展条件下产生“时代困惑”是正常的,因为人类历史在不断发展,没有困惑倒是不正常的。问题在于面对困惑采取怎样的态度。显然,因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出现了困惑而加以否定,或者对这些困惑视而不见都不是正确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正视这些困惑,并且在结合当代实际阐释这些困惑的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在这方面,宝宏教授的著作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它不仅毫不隐讳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全球化条件下遇到的主要困惑,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和社会实践的历史发展两方面深入探讨了这些困惑产生的原因。应当说,这些原因分析是颇有见地的、有说服力的。全书在此基础上对“困惑”作出的解读也捍卫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第三,作者改变了单纯研究国家问题的做法,采用了从生产方式变革出发探讨其对国家等政治上层建筑的影响的研究方法。这是符合历史唯物论的原理的。中外许多学者在探讨国家问题时,总是将国家问题限定于政治学范围,认为它与经济无关,就国家理论本身讨论国家理论。这样做虽然也能写出洋洋大观的著作,但往往难以得出正确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一个社会形态中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除了对它们自身的研究之外,最根本的应当从该社会生产方式的变更中得到解释。宝宏教授的著作在对全球化中的国家问题展开讨论之前,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变革进行了讨论。他从全球范围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当代科技革命的影响、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的全球金融体系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少数发达国家向全世界蔓延的变革。他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和国际政治问题的研究置于这一变革的基础之上,因此,得出了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第四,作者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适用条件和范围的问题。列宁早在十月革命前就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

4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魅力

绝对规律。(《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列宁根据这条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著名论断,并且成功地领导了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战后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继续证实着列宁的理论。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如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没有再发生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似乎不绝对了。对此,宝宏教授认为,列宁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有着特殊的历史条件和适用范围,其历史条件即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着国际政治的主要舞台,全球化还没有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大多数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其适用范围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上述历史条件和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是“绝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并加入联合国,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占据国际政治主要舞台的情况已经发生改变。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阵营稳固存在,发展中国家反对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斗争不断加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虽然仍存在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但为了应对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和发展中国家的反抗斗争,相互勾结起来,共同利益压制了彼此之间的矛盾纠纷。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已经不那么“绝对”了。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不会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及其重要作用。

第五,作者提出了阶级斗争分层化以及国际阶级斗争主宰国内阶级斗争的观点。众所周知,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没有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就不会有无产阶级专政,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国内外相当一些学者,在讨论全球化中的国家问题时都撇开了阶级斗争,似乎全球化已经淹没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自然也就无足轻重了。但宝宏教授的著作没有绕开阶级斗争,不仅没有绕开,而且全书自始至终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其中,颇为引人关注的是全球化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分层理论。他认为,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已经使阶级斗争不仅表现于各个国家的内部,而且越来越多地表现于全球范围。他结合当代实际重新审视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范畴,分析

了全球化进程中国际范围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指出全球化导致阶级斗争出现两个层次:国际层次的阶级斗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反对伴随跨国垄断资本迅猛发展而兴起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国内层次的阶级斗争是单独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本国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由于全球化对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也越来越强烈地影响,甚至支配着各国内部的阶级斗争。2011年9月发生在美国并波及欧美其他国家的“占领华尔街”“99%的人VS1%的人”运动,不是又一次展示和证实了上述理论吗?

第六,作者论述了全球化进程中典型国家的示范作用。历史上,国家之间的相互示范早已存在,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阐述的却并不多见。宝宏教授的著作结合全球化的历史进程,阐述了国家示范效应的一般理论,并对当今世界影响较大的霸权资本主义国家、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等三种类型国家的示范效应,作了简要的述评。作者客观地评价了霸权资本主义国家、福利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的种种优势,也分析了这些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难以解脱的困境,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示范效应将随着自身困境的不断加剧而日渐减弱。与此同时,作者对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示范效应也作了客观的述评,尤其是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范效应作了简明而准确的概括,并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示范效应不断扩展的历史必然性。其中重要的不仅在于该著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示范效应作了阐述,而且在于这一阐述的背后似乎在告诉人们: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有所减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联手剥削和统治世界各国人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蜕变、社会主义革命继续在一个个国家较快取得胜利的条件并不具备的时代背景下,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能够通过对上层建筑的自觉调整和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获得强大的生命力,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示范效应正在向全世界散发着“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强烈信息,正在启发着世界人民反复思考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伟大预言。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示范效应,对全球化条件下各国乃至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动员和推动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6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魅力

除以上所说外,宝宏教授的著作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利益、全球治理和国家消亡等热点问题,也都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进行了深入探讨。不能说这些探讨都是尽善尽美的,但可以肯定,作者在这些重要的时代课题上同样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例如,作者并不认同全球化中存在着抽象的具有普遍价值的“国家利益”,而是正确地指出国家利益在任何时代都是具体的,在其背后有着各国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阶级本质。又如,作者并不认为当今世界已经形成了超阶级的“全球治理”,但指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大量国际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的全球治理有利于全球民主的进步。再如,作者并不认为全球化能够使国家自行消亡,而是正确地论证了“大多数国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国家消亡的必由之路”。在诸如此类问题的讨论中,作者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维方法。因此,读宝宏教授的著作让人感到马克思主义勃勃的生机和活力。

宝宏教授的力作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作出了贡献,在此向作者表示祝贺!我相信,处于中外学术前沿的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一定有更多的富有时代气息的马克思主义优秀论著问世。

程恩富

2011年10月于北京太阳宫宿舍

(程恩富系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前 言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富有魅力的。它的魅力不仅来自其难以抹杀的客观真理性,以及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对它的始终不渝的信奉,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来自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对它的恐惧。在当今时代,或者说在被人们一再渲染的全球化时代,由于国家与全球化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交叉关系,国家的职能和作用在全球化中发生了种种变化,国家问题越来越成为引人关注的时代课题。然而,在中外学者的大量论著中,我们很难见到代表或发扬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精神实质的思考,似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魅力正在被“全球化”大潮所淹没。但我却坚信,在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仍然是富有魅力的。这种魅力不是对其进行曲解或干脆置之不理所能抹杀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使这种魅力展示出来并且继续发扬光大。

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去除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体系的国家理论部分,马克思主义可能更容易被资产阶级所宽宥,马克思生前的物质生活状况也不至于那样窘迫。然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整的、有机的理论体系,其国家理论不仅不容去除,而且必须以其哲学、经济学等方面理论为基础才能更充分地显示出客观真理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中带有结论性论点的部分,其中在历史唯物论指导下形成的关于国家的起源、国家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发展、消亡的一般规律,指明了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消除了一切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其科学价值是迄今为止任何一种国家理论所无法比拟的。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还是随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不断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这一理论以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都曾结合各自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发展了这一学说。因此,马

2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魅力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也是不容割断的。这样一种理论,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寻求解放的革命斗争,对于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无疑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建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指导下实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亚洲和美洲相继建立起十多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指导下实现的。1989年以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剧变(这并不能否定这些国家曾经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指导下建立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客观事实),这种暂时的倒退还不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失效,只能说是社会主义向更完善、更成熟阶段跃进过程中的休整。而社会主义中国仍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通过创造性的改革开放,正在努力建设现代化的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指导分不开的。我们相信,只要世界上存在着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就不会失去其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还应当看到另外的情况。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其国家理论似乎就是备受争议的部分。早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前,时为第二国际主要领导人的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就因为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背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鼓吹“阶级合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超帝国主义论”等观点,而被列宁指斥为修正主义。在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也从未间断。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系统地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国家理论,或者说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从其理论体系中“剥离”出来。如德国学者亨利希·库诺在192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一书中,就全面地探讨了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思想渊源和主要理论观点,但他没有忘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忽略了国家自19世纪60年代就已具有的“新的职能”和“变为管理国家”的“失误”。^①其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并且从上层建筑、文化、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等方面深化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如意大利学者葛兰西的国家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国家理

^① [德]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第1卷,袁志英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41—344页。

论与列宁国家理论的一致性,在1916年发表的《社会主义与文化》一文中,以及在1926年被捕以后陆续撰写的《狱中札记》中,都论述到上层建筑、文化、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和对国家职能的重要作用,其中关于“许多阶层在意识形态领域仍沉浸在以前的历史环境的文化中”,因而“新的知识分子”应当与“新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决定和组织文化革命”、“清算新的社会群体的不同阶层所特有的文化”^①等思想,应当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贡献,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如结构主义学派的阿尔都塞、普兰查斯,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都具有很大影响。其三,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从结构、功能、制度等方面深化国家问题的研究。如20世纪20年代兴起,50年代后一度流行的结构主义学派,法国学者阿尔都塞在1965年出版的《保卫马克思》和1968年出版的《读〈资本论〉》等著作中,希腊学者普兰查斯在1974年出版的《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和1978年出版的《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等著作中,都从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经济三种结构的视角研究国家问题。而普兰查斯与比利时学者米利班德在国家理论方面长达数年的争论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形成了“结构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分野。^②其四,对发达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制度展开的研究。如奥菲在《福利国家的矛盾》一书中,围绕着“资本主义不能没有福利国家,但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的“奥菲悖论”,探讨了福利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各种矛盾,以及福利国家与社会主义未来的关系^③。普兰查斯在《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现代资本主义下的阶级》、《国家政权与社会主义》等著作中也探讨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问题,他认为“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缓解了资本主义危机,但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他排除了在西方国家出现列宁主张的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但主张工人阶级通过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斗争实现由发达资本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的过渡。英国学者杰索普在对普兰查斯国家理论进行认真梳理和“修正”的基

① 转引自[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主编:《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黄华光、徐力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② 参见[美]史丹利·阿若诺威兹、彼得·布拉提斯编:《逝去的范式:反思国家理论》,李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③ 参见[德]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基础上,提出一种在欧洲发达国家既能避免“福特制”福利国家危机,又能保证“后福特制”积累的“经济和政治的重组”方案,即“去国家化的、以管理为基础的、熊彼得式福利政体”。^①其五,对苏联官僚社会主义体制的批评。除葛兰西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大都对列宁、斯大林的国家理论和国家模式持批评态度。其中法国学者亨利·列菲弗尔在1976年出版的《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一书中,就批评“列宁在1917年革命的想象表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幼稚”^②,并且将斯大林与希特勒并列,认为斯大林“与希特勒同时,把国家建成一个政治专制体”^③。曾长期担任托派第四国际领导人的比利时学者曼德尔在1992年出版的《权力与货币——苏联社会主义官僚体制》^④一书中,对斯大林以来的苏联“过度膨胀”的“官僚主义国家机器”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其六,对世界体系与国家关系的研究。如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分别1974年、1980年、1989年出版的三卷本《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以及1996年与特伦斯·K.霍普金斯等人合著的《转型时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等著作中,超越国家的视野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概念,并且对世界的发展脉络及其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以上诸方面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有引人注目的和富有价值的见解,但有三点是十分明显的。1. 除葛兰西外,上述学者的论著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它们大都是从西方(或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中寻找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不足或“过时”的部分,借以提出各种脱离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国家理论,因此,挑剔多于论证,质疑胜过信奉。2. 上述学者主要研究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国家理论则很少研究,如果有也完全是持否定和批判态度。换言之,他们对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实现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

① [英]鲍勃·杰索普:《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载[美]史丹利·阿若诺威兹、彼得·布拉提斯编:《逝去的范式:反思国家理论》,李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202页。

② [法]亨利·列菲弗尔:《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李青宜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③ [法]亨利·列菲弗尔:《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李青宜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34页。

④ 参见[比利时]厄内斯特·曼德尔:《权利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国家理论不感兴趣,割断了列宁、斯大林国家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理论的内在联系。3. 多数学者或者是由于生活的年代“全球化”的势头还没有那么猛烈,他们的论著中关于国家与全球化的关系、国家职能在全球化中的演变等方面的探讨并不深入。

对于国家问题的探讨,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研究之外,西方国家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大量涌现。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西方学者从全球化的视角对国家问题、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职能以及国家与全球政治体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无论其讨论问题的视野,还是各种成果引起的关注程度,都已超过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括起来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其一,全球化对于国家的冲击方面的研究。如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在1997年发表的《超越民族国家》一文中,就提出了全球化使得“社会福利国家妥协面临终结”和“超越民族国家”等问题。^① 英国学者吉登斯在1985年发表的《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探讨了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权力的变化,并提出了融国家政治与全球政治于一体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权力构想。^② 德国学者岸迪格·福格特在1996年出版的《国家的新外衣——现代国家的发展》一书中认为:“在20世纪终结的门槛,传统民族国家的主权已经所剩不多了”。^③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1990年出版《无国界的世界》一书,即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利益”业已“终结”。^④ 2006年他又出版《无国界的世界:民族国家的终结》一书,认为,由于当今世界的资本、产业、资讯、产品、人员都是跨国界的,民族国家用来区别彼此的心理基础更加薄弱,民族国家在全球经济方面已经沦落为跑龙套的小角色。据此他极具超前性地预言,全球化已使民族国家走向终结。^⑤ 其二,关于全球化所要求的全球治理和善治的研究。如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

① 参见[德]乌·贝克·哈尔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② 参见[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③ 转引自[德]乌尔里希·贝克等:《全球政治与全球治理》,张世鹏等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④ 参见[日]大前研一:《无国界的世界》,黄柏棋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⑤ 参见[日]大前研一:《无国界的世界:民族国家的终结》,李宛蓉译,台湾立绪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2002年出版的《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一书中认为,“民族国家是未完成的国家”,“世界主义国家是通过与全球公民社会的融合而形成的国家”,^①是民族国家发展的未来趋势。美国学者雅克·布道、萨阿德·纳吉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出版的《建构世界共同体——全球化与共同善》一书中,主张以联合国框架为基础建立具有全世界人民需要的“民主”、“共同善”等特征的“全球共同体”。^②英国学者托尼·麦克格鲁在《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一文中认为,“今天的多层全球治理形式是扭曲的”,需要“一个更民主的、更有责任感的全球治理体系,保证其作为世界各国和人民的代表并对他们负责和作出回应”。^③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在2001年出版的《共同体》一书中,主张在全球化中建立“一个用相互的、共同的关心编织起来的共同体”,“一个由做人的平等权利和根据这一权利行动的平等能力的关注与责任编织起来的共同体”。^④其三,关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利益问题的研究。如里查德·恩格尔在1988年出版的《确定标准的美国利益》一书中、康纳德·诺切特莱因在《国家利益的概念》一书中、玛莎·费丽莫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一书中,都对国家利益的概念、全球化中国家利益的摩擦与维护,以及国际组织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其四,全球化进程中的权力流散问题研究。如英国学者Susan Strange在1996年出版的《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一书中,对全球化进程中“衰落的国家权威”、“权力类型”和“权力流散”的方式等问题,从理论和经验数据等方面提出了发人思考的见解。^⑤日本学者星野昭吉在2001年出版的《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一书中,提出全球化中出现的“超国家主体”使得国家的“存在方式受到限制,其作为

① 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蒋仁祥、胡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参见[美]雅克·布道编:《建构世界共同体——全球化与共同善》,万俊仁、姜玲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150页。

③ 参见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9—104页。

④ [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页。

⑤ 参见[英]苏珊·斯特兰奇:《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肖宏宇、耿协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权力组织的地位也受到削弱”^①等问题。其五,全球化进程中“帝国”问题的研究。如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和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合著并在2002年出版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认为,全球化进程并不完全意味着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而是形成了“继续统治着经济和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新的全球主权形式”——“帝国”,而“帝国”在全球化中“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②同样,加拿大学者艾伦·伍德在2005年出版的《资本的帝国》一书中,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已经成为依赖纯经济手段(资本与市场的力量)对世界进行统治的“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资本主义帝国”,^③他对这一帝国运用“经济霸权”对全球进行“经济控制”的方式和手段(包括军事手段)进行了深入的阐述。而英国学者贾斯廷·罗森伯格在2001年出版的《市民社会的帝国》一书中则认为,帝国如果不“意味着政治控制超越原有共同体领土的扩张以便增加来自外部的资源”,则将导致“一种新型的帝国,即市民社会的帝国的兴起”。^④

以上诸方面的研究并未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相去甚远。但其研究成果强烈地反映着国家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的种种趋向和学者们的预期。概括言之,也有两方面明显的共性:其一,上述学者普遍关注到全球化进程中超越国家的全球治理和全球治理机构问题;其二,上述学者大都没有从全球范围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考察全球化中的国家和全球治理。

当然应当看到,并非所有西方学者都忽略了全球化进程中有关阶级关系变化的研究。事实上,尽管产生的影响不够大,但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包括上述的部分学者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的著作中,都有一些反映西方国家阶级关系变化的观点。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以下两方面:其一,西方国家的工

① 参见[日]星野昭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刘小林、梁云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182页。

② 参见[美]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加]艾伦·伍德:《资本的帝国》,王恒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

④ 参见[英]贾斯廷·罗森伯格:《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人阶级已发生变化。如德国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早在1959年发表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一文中就认为,“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已经由“绝对贫困”转为“相对贫困”,逐渐地“又为相对来说的满足感所代替,”“这些变化都有助于减缓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冲突的激烈程度,而发生突如其来彻底的结构性变革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①美国学者马尔库塞在1964年发表的《单向度的人》一书中也认为:在西方国家“一些技术最发达的企业中,工人们甚至夸耀他们在企业中得到的既定利益”,“工人阶级似乎已不再与已确立的社会相矛盾。”^②美国学者埃里克·欧林·赖特在1985年出版的《阶级》一书中,根据对瑞典、美国大量实证材料的分析指出,在这些国家“尽管工人阶级是最大的阶级,但是有相当比例的劳动力占据着阶级结构中的剥削性定位”^③。就是说发达国家的部分工人具有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双重身份。作为“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英国学者欧内斯托·拉克劳,在1987年发表的《阶级“战争”及其之后》一文中认为:在“工业化的西方”,工人阶级作为“变化的历史性力量”已经不再有效了。“工人阶级……并非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普遍阶级’,并非是全世界人类解放的必然代理人。”^④诸如此类的意见还可以举出很多。在这些学者看来,西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状况已大大改善,其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即使没有完全绝迹,对历史的影响力也已微不足道了。其二,全球化过程中已出现了全球阶级或“跨国统治阶级”。如美国学者理查德·斯克拉在1976年发表的《后帝国主义:跨国公司扩张的阶级分析》一文中就认为,随着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在全球出现了“国际公司资产阶级”,在跨国公司子公司的东道国出现了“管理者资产阶级”。^⑤英国学者莱斯利·斯克莱尔在2001年出版的《跨国资本家阶层》一书中认为,

① 参见[德]拉尔夫·达伦多夫:《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李朝晖译,载李惠斌、李朝晖主编:《后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页。

② 参见[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③ [美]埃里克·欧林·赖特:《阶级》,刘磊、吕梁山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

④ 参见[英]欧内斯托·拉克劳:《阶级“战争”及其之后》,载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⑤ 参见曹义恒、曹荣湘主编:《后帝国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